

【主持人语】本期专题为：杨慎入滇五百周年纪念专栏。

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杨慎因“大礼议”忤朱厚熜，被廷杖后“长流永昌，永不叙用”，终老滇南。今年恰是升庵谪滇500周年，《昆明学院学报》推出“杨慎入滇五百周年纪念”专栏，是对升庵入滇的纪念和致敬，对推动升庵研究有积极意义，也是传承发展云南优秀历史文化的有益举措。

杨慎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是明朝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流人物，其气节、才学、遭遇和成就让他始终是话题人物，学界和民间津津乐道。21世纪以来，全国杨慎研究进入新阶段，文献整理、生平研究、学理阐释不断拓展和深化，成果累累，升庵的品格、文化成就及其价值、文化史地位得到进一步阐发和凸显。升庵家乡四川尤为重视，2018年1月，四川大学成立杨慎研究中心，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4月四川省杨慎研究会成立。中心和学会组织开展杨慎研究，推出了系列成果。湘潭大学文学院形成杨慎研究团队，编纂《杨慎全集》，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全国各高校研究杨慎的博硕士论文屡见不鲜。升庵研究呈现欣欣向荣。

升庵在滇35年，云南是其第二故乡，他对云南文化影响之大，罕有伦比；其文化成就，主要是在云南取得的。李一氓先生曾为新都杨升庵纪念馆题词说：“升庵功业，当以在云南推行中原文化，使汉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与融化，对中华民族成长有贡献。”滇人敬之爱之，“风徽追仰三百年。”但当代云南的杨慎研究却颇为冷落，研究队伍、产出成果、学术影响与其在滇成就和贡献极不相称。2023年7月，西南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发起，并与云南大学文学院等首次主办“杨慎与云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冷清的水面溅起一片浪花。会上有学者指出，云南的杨慎研究，“官方缺位”“学者缺位”，云南对不起杨升庵，引起强烈共鸣。会议指出，云南具有独特学术优势，在深入开展杨学研究中大有可为。

本专栏刊发3篇论文，茶志高文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李一氓老的卓论，阐明了升庵诗对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意义。高云翔文通过对升庵诗中“滇海”地理意象多层意蕴的辨析，揭示升庵在滇心路历程和诗歌特征，虽不无稚嫩，然锐气可嘉。拙文属升庵接受史研究，通过考论写韵楼题咏升庵诗，证明历代文化人对他的崇仰和他绵绵不绝的影响，并阐述了他和云南的双向互动关系、名贤遗迹的感发作用。三文均有角度新颖、以小见大的特点。

当前，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赓续历史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党和国家的文化战略，加强对杨慎这位“对中华民族成长有贡献”的杰出文化人的研究，就有重要现实意义。期望有更多云南学人研究升庵，将其人品风范和文化成果转化为当下精神资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贡献。

(陈友康)

风徽追仰三百年：写韵楼题咏升庵诗考论*

陈友康

(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云南昆明 650031)

【摘要】杨慎人品俊伟，成就卓越，滇文化人和外省来滇士人对他的崇仰和怀念是一个化不开的情结，瓣香顶礼，不断从他身上汲取人格力量和思想智慧，题咏升庵之诗层出不穷。感通寺写韵楼为升庵在滇遗迹中最显著者之一，题咏之作洋洋大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云南人文的杰出贡献和绵绵不绝的影响。同时，升庵在滇发愤著书，云南成就了他“一代伟人”的英名，他和云南实际上构成双向互动关系。写韵楼诗表明名贤遗迹对人有显著的感发、净化和升华作用。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要保护和利用好名人遗迹。

【关键词】杨慎；写韵楼；升庵遗像；题咏诗；接受史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4)04-0105-10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4.04.011

* 【作者简介】陈友康，男，大理宾川人，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和云南文化。

杨慎是明代最杰出的文化人之一，因“大礼议”被永久流放云南，于其本人而言，是要付出一生代价的悲剧，对云南而言，却是千载难逢的机运。一是他居滇35年，遍游南中，写了表现云南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大量诗文，及《滇载记》《滇候记》《云南山川志》诸书，让云南之美传扬天下。二是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云南文学迅速崛起，达到历史高峰。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说：“滇中风雅，实开于升庵，故有杨门六君子之称。当时以媲苏门六君，文采风流，极一时之选，亦吾滇艺林佳话也。”他是云南文化的的天不亡功臣。

因此，杨升庵受到滇省绅民普遍崇敬和纪念，“风徽追仰三百年”（林则徐《写韵楼拜杨文宪公像》）。生前，云南士人、官绅与之交游唱酬，接其警欬，睹其风采，沐其德泽，而他启导提撕，气运大开，云南文坛遂呈彬彬之盛；去世后，不同时期的学人、官员造访其遗踪，追慕其德业，故题吟之作连篇累牍。湖北江夏人程封清康熙间任南宁（今曲靖麒麟区）知县时撰《杨升庵先生年谱》，辑录明清38家与杨慎唱酬及挽悼诗，都为一卷，附于《年谱》之后。剑川赵惠元道光间纂《杨文宪公写韵楼遗像题词汇钞》（以下简称《汇钞》）一卷，收录彼时所见清人咏升庵遗像诗作。今人王文才撰《杨慎学谱》专设《交游诗钞》，辑录从（明）张含到近人杨庶堪64家与杨慎唱酬及题咏诗词。王书所收已颇为可观，但远未完备，滇诗人咏升庵诗作在滇诗别集中层见叠出，蜀中和全国其他省题咏诗亦应不少，实难穷尽。足见升庵之受人尊崇。

升庵在滇，广受欢迎，故遗迹众多。其中，昆明西山高峣碧峣精舍（今升庵祠）和大理点苍山写韵楼最负盛誉，参谒名人络绎不绝，题咏之作遂夥，构成升庵崇仰史和接受史的华彩篇章。本文论写韵楼题咏诗，从一个侧面切入，在考实的基础上，阐发重要文本之意蕴，彰显升庵人格光辉和成就，进而辨析其在大礼议中的行为之意义，揭示他与云南的双向互动关系、名贤遗迹的重要价值等。

一、杨升庵与写韵楼：叶榆千楼俱废斯楼传

点苍山感通寺，亦称荡山寺，升庵改称海光寺，是大理最著名的佛寺之一，风景奇胜。（明）陈文纂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载：“感通寺，旧名荡山，又名上山寺，唐僖宗时所创也。去府治十里许。寺有三十八院，林木葱篳，优雅迥绝，甲于诸寺。”清黄元治《荡山志略》卷上说：“荡山在圣应峰之麓。世传东方阿闍佛来山说法，先期洱海龙王吐水涤荡，因名。”荡山又称班山。“感通”得名之由，明初云南布政使张紘《感通寺记》（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二《大理府》）载住持无极的解释说：“一事最为灵异，此寺所成之日，住持者焚香默祷，一夕，有佛像自城中飞来奠于位，即今大雄殿未燔之佛也。”所谓洱海龙王吐水涤荡，佛像受僧人之虔诚所感从大理城中自动飞来落于佛座，且烧不坏，都是信徒“自神其说”，姑妄听之。无极在傅友德平大理不久于洪武十七年（1384）率僧人到南京朝觐明太祖，献花献马献赋，陛见时马嘶花放，太祖大喜，予以优礼，并御制诗18首赠之（见无极《朝天集》，《云南丛书》本），无极勒石膜拜，遂为镇寺之宝；杨升庵在感通寺著书，李元阳将其住处命名为写韵楼；徐霞客游寺；担当晚年住锡，圆寂后葬于此，这些逸事使感通寺名重滇中。担当联曰：“寺古松森，西南揽胜无双地；马嘶花放，苍洱驰名第一山。”

写韵楼是感通寺中的一座小楼，因杨升庵而风流千古。升庵《游点苍山记》（《万历云南通志》卷二）载，嘉靖九年（1530），他与李元阳（中溪）、董难等游苍山，“投感通寺楼，篝灯夜坐，闻寺僧诵等字。中溪曰：六书中转注实非‘考’‘老’，而宋人妄拟，后世学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无述，愿公任之。予遂操笔，而书转注之例约千余字，汇为一编。中溪题其额曰‘写韵楼’。寓此凡二十日而后去。”他在写韵楼所著书为《转注古音略》。升庵友人、云南巡抚顾应祥命云南右卫正千户郭彬榜书“写韵楼”悬壁。其后升庵至大理，多寓写韵楼。中溪以“韵”名楼，盖有两层含义，一是音韵之韵，二是韵事之韵。这段故事成就感通寺的千古佳话，于是“万里南迁重此楼”（赵惠元《汇钞》卷首题诗），慕升庵盛名者“个个来登写韵楼”（桂馥《嘉庆丁巳晓园廉使属题升庵先生像》），遂使“叶榆千楼俱废斯楼传”（担当《写韵楼歌》）。

二、写韵楼升庵遗像：长奉真形照青史

近些年，文学图像学兴起，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考察文学家画像是文学图像学

的研究内容之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洋说：“图像进入坟墓却是为了对抗死亡，图像永远对当下敞开而拥有恒久的魅力，重解图像极具价值。”^① 流传于世的文学家图像更有“对抗死亡”的意义。已去世的文学家，通过画像保留其神采，向后人“敞开”，供后人瞻拜，并激发文学家创作诗文（题诗题跋作记），使图像承载的意义不断增长、丰富，而逝者精神借以长存、光大，也是很有魅力的事情。对升庵遗像的接踵题咏，证明了这一点。

“升庵生前，已有造像，卒后传写滇蜀，遍行海内。”^② 写韵楼旧悬升庵遗像，始于明末清初。赵惠元《汇钞》小引说：“道光壬寅（1842），榆城院试后，游班山，宿海光寺，登写韵楼，拜杨文宪公遗像，为明季蒙化遗老陈翼叔摹自昆明李近楼圣谟家，以寄雪老禅师，悬之楼上。二百年来，题咏已满，剪烛雅诵，留连不忍去，既哀录为卷，俟刻而咏之。”书中有明著名遗民诗人陈佐才（翼叔）识语曰：“此像得于会城李近楼先生家，摹寄雪老禅师，悬于班山写韵楼，以不忘升庵。先生于嘉靖丙申间常住此楼，著《六书转注》之遗迹。”这是关于写韵楼升庵遗像的最早记载，是赵惠元从遗像上钞录的，交代了遗像来源。此像林则徐道光二十九年（1849）仍见之。辛亥年（1911），赵藩游感通寺，见写韵楼已毁于兵燹，“僧言像帧亦久不存”（《汇钞》卷首赵藩题识）。盖毁于咸同滇乱。

李圣谟详情已不可考，只知他与升庵有交情。程封代理昆明知县时，访升庵遗迹，从圣谟裔孙、生员李贤喆家得升庵遗像而摹写之，并作《像赞》，一同刻于《杨升庵先生年谱》卷首。《像赞》序说“祖近楼与太史交”，则李圣谟家画像应作于升庵生前，其来有自，是较为接近升庵原貌的。王文才先生认为：“滇中传写，以昆明李近楼家藏为祖本。”^③

考《荡山志略》，雪老禅师应是广厦。《志略》卷上《人物》曰：“广厦，号广雪，安宁州沈氏儒家子也。幼时闻经声佛号，辄踊跃不已。及长，善病。流寇入滇，亲亡家破，遇担当和尚，遂剃发从游，入水目山参无住和尚受戒法。住师命参‘无’字有省，时时请益，皆契宗旨。后随担当入鸡山阅大藏，愈拓冥悟。已，乃住班山，罄力修葺。衣钵之外，绝无长物。人谓其静虚若谷，能断葛藤，真无忝于师承云。”“流寇”指孙可望大西军残部。无住洪如是明末清初滇中著名高僧，担当从其剃度，广厦是担当弟子，亦从无住受戒，陈佐才系担当挚友，与僧人交往密切，且时代相若，“雪老禅师”者，当为广雪之敬称也。

画面升庵形象，王文才先生以为是杖履图，并认为是据升庵生前请人摹写之图仿制。他说：“此像乃仿宋人写东坡偃耳出游之意，即滇中所传升庵杖履图。图作方巾野服，拄杖行游之态，仿东坡拄杖图意，有别于家像冠裳高座，实杨门师友所传小影。从李（近楼）本出者，一在大理写韵楼，一在高峣太史祠，各有摹本及石刻，流传不绝。”^④ 写韵楼石刻像，李根源 1912 年到大理处置滇西事变，游感通寺时曾见之：“大理感通寺即升庵写韵楼故址，与升庵曳杖石刻像，壬子（1912）之夏偕张督文光瞻拜之。”（由云龙《高峣志》下卷）未提画像，则此前已毁。复考严遂成《拜升庵先生遗像》“兵火销沉后，丹青尚俨然。鹤羸抡杖骨，松老著书年”，林则徐《写韵楼拜杨文宪公像》“雪鬓霜髭写旅愁，芒鞋竹杖恣诗料”，孙士毅《题升庵先生画像》“如何曳杖疏闲貌，洱海行吟堕瘴烟”，均突出“拄杖行游之态”，足证王先生的推断是可靠的。

写韵楼升庵遗像向登楼的诗人“敞开”，他们顶礼膜拜，写了许多诗，构成独特的文学景观。遗像让升庵风神长存，“长奉真形照青史”（林则徐《写韵楼拜杨文宪公像》），而诗人的吟咏更是让他始终活在当下，确实有“抗拒死亡”的效果。

① 李文博. 北京大学第七届“文学与图像”学术论坛顺利举办 [EB/OL]. (2023-09-20) [2024-02-15]. <https://sfl.pku.edu.cn/kygl/kydt/153493.htm>.

② 王文才. 杨慎学谱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336.

③ 王文才. 杨慎学谱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336.

④ 王文才. 杨慎学谱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336.

三、《汇钞》本写韵楼诗：才名死后千载重

赵惠元是个有心人，登写韵楼而汇钞升庵遗像题咏之作，并系以作者简介，使诗作未随遗像俱毁，作者亦可凭其简介而进一步考知，良可宝贵。赵惠元是赵藩世父，辑刻《云南丛书》时，赵藩弟赵萱从村塾中得钞本示石禅，“讹舛蠹损，勉事校讎，别钞一过，乃可成诵”（《汇钞》卷首赵藩题识），然后收入《云南丛书》付刻而得以流传，此亦赵氏兄弟一功德。石禅叹曰：“此卷未罹劫灰，宁非后幸？”

《汇钞》依次收刘彬、黄元治、王文治、王昶、赵文哲、曹仁虎、张裕穀（河南仪封人，迤东道台）、博明、屠可堂、桂馥、杨霁（太和人，河南涉县知县）、苏惇、佚名、严遂成（浙江乌程人，嵩明知州）及赵惠元14人诗作25首。下面考述其中几位诗人，并简析代表性文本。

刘彬，《汇钞》云：“玉章，霍邱人，流寓永北。”彬，清初人。《乾隆永北府志》卷二十二《流寓》：“刘彬，字玉章，江南霍邱人。善诗文，工草书。总镇（永北镇总兵）马声延为壶山诗社长，后为总镇汪一贵内幕，遂家于永。”著有《全滇疆域论》《铁园吃语集》等。《汇钞》收其《康熙己巳（1689）正月瞻升庵像》：“当时写韵人何在？胜迹犹存写韵楼。若使贾生非痛哭，何缘李白得长流？才名死后千载重，戍客身前一世休。细睹遗容应再拜，予怀渺渺为君愁。”谓升庵因痛哭谏君而被流放，付出一生代价赢得千载重名。

黄元治，安徽黟县人，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政绩突出，“品学为海内推重”（《新纂云南通志·名宦传六》）。两度供职云南，康熙二十八年（1689）前后任大理府通判，康熙四十一年（1702）复出任澄江知府，兴利除弊，两袖清风。在滇著《滇南草》，咏大理风物之诗颇多。通判大理时，纂成康熙《大理府志》三十卷、《荡山志略》二卷，有功大理文献。他多次游荡山，作《康熙辛未登写韵楼瞻升庵先生像》《癸酉再瞻像题于松韵楼》《海光寺写韵楼怀杨升庵先生再题像上》诸诗。《康熙辛未登写韵楼瞻升庵先生像》：

威风巢禁林，本非炫文采。浮云翳朝阳，骇浪簸沧海。
丹羽触网罗，苍鹰踞鼎鼐。吁嗟杨夫子，仗节率寮案。
沥血扬昌言，泣叩君门根。贾生痛哭书，汉文不见采。
谪居万里余，主圣臣引罪。感恩赐不死，投荒复何悔？
怅望君与亲，胸怀独郁垒。天地悯孤臣，瘴毒不能瘳。
草木有阳春，生还应可待。迢迢滇以西，飘零数十载。
题咏满名山，苍山尤蓼藿。上有高僧庐，海光遗迹在。
嵯峨写韵楼，笔精吐烟霏。清节留松筠，幽芳结兰蕙。
伊余生何晚，杖履追莫迨。遗像瞻于今，须眉雪皑皑。
中有不死心，扣之发光彩。

康熙己巳为康熙三十年（1691）。诗写升庵不惧鼎鼐，自投罗网，率同僚痛哭进谏。“沥血扬昌言，泣叩君门根”指大礼议中杨慎等200余人跪伏于皇宫左顺门，撼门恸哭，“修撰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明史》卷七十九）但忠言不被嘉靖帝（汉文指朱厚熜）采纳，谪居万里之外。升庵九死不悔，心中始终忠于君王，而念及亲人，不免惆怅。天地同情他，瘴毒不能侵害。他在滇“飘零数十载”，写了大量诗作，“题咏满名山”，写点苍山的尤为巍峨特出。“笔精吐烟霏”指他在写韵楼著书赋诗文。扼要描述了升庵遗像特征：手持竹杖，须眉皆白，神采焕然。最后颂美升庵松竹般的“清节”和兰蕙般的“幽芳”，表达追随之意。多用比兴，意境沉郁，诗艺亦佳。

《海光寺写韵楼怀杨升庵先生再题像上》其二：

丹青留得谪臣颜，望阙心劳鬓发斑。
非是金门归未得，君恩赐与点苍山。

说靠画的摹写，人们能跨越时空睹升庵容貌。其身于边陲，心系朝廷，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不免憔悴，鬓发斑白。妙在结句，升庵游点苍山，住写韵楼，作诗文彰显其特征，传扬其美名，故明世宗惩罚他的

行为反而成了“恩赐”。对升庵残酷，对点苍山、对云南，倒真是莫大“恩赐”，蚌病成珠，反常合道。

王文治、曹仁虎、王昶、赵文哲均江南名士，声华素著。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四年（1769），清高宗为反击缅甸侵扰，发动征缅之役，王昶、赵文哲从军入滇，所作滇事诗极多。^①军余往来于昆明、腾冲之间，经过大理，游感通寺，瞻拜升庵遗像而题诗。曹仁虎官至侍读学士，考王昶《曹仁虎传》（《春融堂集》卷六十五），仁虎未有到南中之经历，其诗题作《寄题升庵先生遗像》，则是从外地写寄感通寺，由他人书于遗像者。又，王文才《杨慎学谱》从《新都县志》辑得孙士毅《题升庵先生画像》，认为是咏写韵楼遗像者。孙士毅亦在征缅戎幕，也许曾游感通寺而赋此诗，或未题于遗像，不见于《汇钞》。

王昶（1724~1806）字德甫，一字兰泉，号述庵，江苏青浦人。乾隆甲戌（1754）进士，累官至刑部右侍郎，晚年深得清高宗优遇。是清代“名满天下”的文学家和学者，著作等身。他两次入滇，第一次是参加征缅之役，为云贵总督阿桂幕僚。第二次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任布政使。他写了《滇行日记》《征缅纪闻》《重游滇轺纪程》《铜政全书》，以及云南题材的诗文，并提携云南人才，有功云南文化。诗文汇编为《春融堂集》（此据陈明澂、朱惠国等点校本《春融堂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王兰泉题升庵遗像诗有一个长长的题目：《余以薄谴从军，往来金齿，每过升庵先生故居，辄作诗志感。今北还，道出龙尾关，博晰斋观察先属太和屠大令携写韵楼先生遗像来乞题，因题一律，附书旧作三首，用表生平瓣香之愿。然先生忤世庙，卒老贬所；余遭逢圣明，未及两年赐环，既以自幸，又益悲先生云》，交代了题诗的缘起和目的。晰斋是博明号，察哈尔镶蓝旗人，时任迤西道道台。屠大令即屠可堂，浙江四明（今宁波）人，时任太和（今大理市）知县，大令是对县令的美称。诗曰：

写韵危楼瞰洱河，流传玉貌未消磨。
中朝仕宦羞张桂，北地文章敌李何。
才子相门前代少，词臣羁迹异方多。
图形合在灵均庙，暮雨修篁带女萝。

“张桂”指大礼议中支持明世宗的张璁、桂萼等人。他们阿附上意，破坏纪纲。此句意为升庵在朝为官，羞与张桂为伍，凸显其气节。“李何”指李梦阳、何景明，前七子领袖，此句意为升庵诗文足与李何颉颃。称杨廷和为内阁首辅、朝廷重臣，杨慎为名满天下之才子，这样的家庭很少见。升庵任翰林院修撰，故称词臣，他羁留云南，留下很多胜迹。把他比为屈原，受到崇祀。首尾二联说写韵楼雄峙点苍山，俯瞰洱海，环境清幽，衬托升庵“玉貌”之高雅。

所谓“薄谴”是指，乾隆三十三年（1768），王昶任刑部郎中，因受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盐引案牵连获罪罢官，自请从军报效。阿桂以兵部尚书兼云贵总督挂帅征缅，知王昶乃干济之才，遂请其从行。乾隆诏许之，让其“自备资斧效力”《清史稿·王昶传》，即自筹经费到战争前线戴罪立功。他于是年十二月入滇，在滇三年，参赞军机，草拟文牍。清高宗称其“久在军营，著有劳绩”，补吏部考功司主事，此即所谓“遭逢圣明”。

王述庵与升庵有相似的遭遇，故对其命运有更深切的感受，多次题诗撰文。在永昌，作《永昌己丑春过杨升庵故居》五律二首、《冬日重经先生故居》七律一首，此即“旧作三首”。在四川，按察使查礼（俭堂）修新都杨慎故居，命名为“升庵雅集”，王昶作《升庵雅集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任云南布政使时巡视永昌，保山知县王彝象重修升庵祠，作《重建永昌杨文宪公祠堂碑》（《春融堂集》卷五十一），均提到他为写韵楼升庵遗像题诗事。

王文治是著名诗人和书法家，乾隆二十九年（1764）出任临安（治所在今建水）知府。征缅时，转

^① 乾隆征缅之役中的文学活动，参见：陈友康·赵翼的云南之行及诗歌创作 [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3)：69-74；茶志高·边事、吏事、文事：乾隆征缅之役从军文人诗作的历史意涵 [J]. 西北民族论丛，2018，(2)：191-212.

输军需，过大理，作《乾隆三十二年观升庵先生像因题》：

点苍山翠点书帷，写韵楼高俯海湄。
自要文章传赙诏，不嫌张桂太倾危。
脱鞋内殿吟诗日，洒泪朝门议礼时。
同是蜀人同被放，永昌归较夜郎迟。

说天意要升庵来云南传播文化，连过度倾轧、迫害他的张璠、桂萼辈都不那么惹人讨厌。这是就升庵来滇的客观效果说的。把升庵和李白类比，突出其豪气。而两人同是川人同被流放，太白未到夜郎即赦归，升庵却老死贬所，遭遇更惨。

桂馥(1736~1805)字未谷，山东曲阜人，著名书法家和诗人，乾嘉学派巨擘。嘉庆元年(1796)赴滇任永平知县，转顺宁知县。嘉庆十年(1805)卒于任所。在滇为官清简，写了一些描写云南风物和社会生活的诗，并著《札朴》等。钱钟书《昆明舍馆作》(《槐聚诗存》，三联书店2002年版)云：“未谷芸台此宦游，升庵后有质园留。”把他和杨慎、阮元、商盘(质园，任元江知府)相提并论，认为都是内地入滇的杰出人物。《汇钞》收其《嘉庆丁巳晓园廉使属题升庵先生像》七绝三首。嘉庆丁巳为嘉庆二年(1797)。据《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五，李亨特字晓园，汉军正蓝旗人，官至东河道总督。乾隆末任云南迤西道，嘉庆初加按察使衔，故称“廉使”。从此可知，李亨特应有题像诗，但不见于《汇钞》，似已散佚。道光广州人邓潜有《百字令·桂未谷杨文宪公画像》，说明桂馥曾摹写升庵像，流传内地。

《汇钞》所收题咏诗，时间线索清晰，感情真挚。诗作内容，集中于以下数端：一是为升庵遭遇鸣不平，表彰其亮节孤忠，表达追随之意。二是谴责造成升庵悲剧的张璠、桂萼等人，讥其阿旨求荣。三是指出坎坷遭遇成就升庵的文学业绩。四是肯定升庵对云南文学的影响。多位作者是清朝诗坛和学界巨擘，他们由衷敬仰升庵，说明升庵感召力之强。而他们的题咏，让升庵熠熠生辉。

四、担当《写韵楼歌》：赖有轳轳成大业

咏升庵写韵楼事之诗甚多，《汇钞》所辑只是题画诗，数量有限，其他诗更为可观。升庵健在时，与吴懋等同游感通寺，吴懋即有长篇歌行《写韵楼歌》(《滇南诗略》卷七，《云南丛书》本)。张含亦有同题长歌(《张愈光诗文选》卷一，《云南丛书》本)。近百年后，担当又作《写韵楼歌》(《担当遗诗》卷三，《云南丛书》本)，可并称三美。兹论担当诗。

担当是明清之际全国著名高僧、书画家和诗人，是云南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方树梅《担当年谱序》说：“担当大师，诗书画三绝，而又志节皎然，非一乡一邑之人物，乃天下之人物也。”“海宇驰誉，金碧有光”。晚年驻锡感通寺，成就“太史名僧共一楼”(万秉义《登写韵楼奉怀杨太史及唐大来》，《荡山志略》卷上)的佳话。《荡山志略》卷上说：“(担当)初栖鸡足，继乃卓锡于班山，修杨升庵写韵楼，坐卧其上，啸咏自得。”《写韵楼歌》曰：

君不见撑天拄地惟气节，丈夫临难当自决。升庵太史重伦彝，触犯天威杖以百。悲哉百杖杖不死，诏还荷戈戍金齿。去来常爱点苍雪，为楼写韵班山里。书法专学铁门限，挥毫全用藏经纸。唱酬日日李中溪，诙谐处处弘山子。戍滇四十有余年，每上斯楼独洒然。摇落风霜公老矣，叶榆千楼俱废斯楼传。生憎斯楼太孤绝，高人披览常不辍。愧我无酒要焙茶，冷灶尘生多扯拽。几株垂柳忒无情，靠墙倚壁委柴荆。其如窟狐又穴鼠，不怜旧燕与新莺。梁间阿谁贻此匾？嘉靖丁酉时代远。灵和之殿已成尘，风光况复忘忧馆。山僧无力可重修，巴蜀乡情重山丘。蜀人首唱诸绪和，金碧辉煌楼上头。挺霄插汉烟云流，使我一眺即能穷九州。从此声韵更清越，憔悴腰肢舞不歇。国朝九十状元郎，公为领袖朝金阙。斯楼若较戍楼高，赖有轳轳成大业。大业既能垂千秋，孤忠焉敢怨迁谪？君不见，关山月！

这是担当诗有名大篇，感情浓郁，精神力度强。诗的内容，一是写升庵因大礼议流放云南及在大理的活动，与李元阳、杨士云等交游，流连山水，诗酒唱酬。二是讲写韵楼因年久而逐渐衰败，成为狐鼠窟穴，莺燕无巢居之处，风光不再；三是写蜀人倡议重修，得到乡绅支持而使之重新焕发光彩，挺立苍山，直

插霄汉，烟云缭绕。据此可以推断，诗当作于楼重修完成之时。《荡山志略》说担当“修杨升庵写韵楼”，据诗意，他只是参与者之一。四是说写韵楼之显赫地位。“叶榆千楼俱废斯楼传”采用对比手法，突出写韵楼的卓绝和升庵的杰出。“生憎斯楼太孤绝，高人披览常不辍”说明登写韵楼参谒升庵的人很多。“生憎”是反语，意为人多到难以招架的地步。五是抒发感慨，高度赞美升庵的气节和文采风流。指出他遭遇坎坷是不幸，而坎坷成就了他的不朽文化大业。开头和结尾议论有力。陈荣昌《滇诗拾遗》卷五评曰：“起二句自血性中流出。”艺术上，议论、叙事、抒情结合，意蕴厚重。诗中还用了升庵名作《垂柳篇》诗意和意象，二者构成互文关系，对读更能理解其意蕴。

五、林则徐《写韵楼拜杨文宪公像》：要与南人益才智

林则徐是近代伟大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其人格风范和卓越事功负天下重望。他与云南关系密切。嘉庆乙卯（1819）任云南乡试主考，公正选才，得士为盛。鸦片战争后，流戍新疆伊犁。道光二十七年（1847）赦免返回，次年出任云贵总督，面对大乱将成之复杂局面，“成算在胸，指挥如意，卒能锄莠安良，大申国宪，不动声色，未百日而祸乱悉平，吾国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周宗麟纂修《大理县志稿》卷九），深得滇人崇仰。著有《使滇吟草》等。

道光二十九年（1849），林则徐到永昌解决汉回纷争，返昆明途经大理，在迤西兵备道王发越等人陪同下参谒写韵楼升庵遗像而作《写韵楼拜杨文宪公像》（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原诗有详细注释，兹略）。诗云：

伏阙批鳞再濒死，杖血未干行万里。尚余小筑对苍山，长奉真形照青史。翩翩公子溯新都，蚤岁才名重桂湖。黄叶吟邀诗老赏，青苔句博相公娱。典坟赅洽时无匹，科目文章俱第一。旧史星文答帝咨，先皇实录咨臣笔。无何大礼议朝堂，阿旨希荣鄙桂张。养士士能甘甯殛，辞亲亲亦罢平章。荷戟初来金齿卫，未忘君国匡扶计。寻甸欃枪从削平，威州杨柳空摇曳。锦衣竖子嫉如仇，三十余年瘴海留。马角非无天语问，蛾眉难脱细人谋。自知不作刀钹唱，醉墨淋漓聊自放。胡粉蛮花恣冶荡，风亭鱼穴随供养。碧峤精舍海庄居，墨洗方池为著书。碧玉泉温春浴后，遥岑楼倚晚风凉。况复叶榆多胜友，海光禅室停裴久。感通缘缔无极僧，转注义商觉林叟。自署头衔作老巖，丹铅万卷遣残年。凭栏把袂同观海，对酒悲歌欲问天。我知遣谪关天意，要与南人益才智。公恕能谐中土音，禺山合作诗台记。不然阿段仅荒夷，风雅何人解主持？差同僂耳苏和仲，便拟潮阳韩退之。又闻榷盐与浚海，弊政胥因片言改。风徽追仰三百年，俎豆宜延亿千载。我亦投荒未死身，重来持节沐皇仁。遭逢相较真逾分，学业无成愧问津。西南近喜么麽荡，归路登楼拜遗像。洱海长虹半天垂，班山初月林梢上。知有英灵驻此中，肯将胜迹委蒿蓬？重新亲桷须吾辈，好蒸旃檀礼寓公。昔从巨集瞻风貌，今之画图亦维肖。雪鬓霜髭写旅愁，芒鞋竹杖恣诗料。被发何时下大荒，魂兮来止足徜徉。彩云城郭长无恙，明月关山休断肠。

此诗系七言歌行，洋洋大篇，是写韵楼题咏升庵诗的集大成之作，表现了升庵流放云南的前因后果、坎坷的命运、卓绝的才华、弘博的学问、正直忠贞的品格、杰出的成就、作者对他的敬仰，以及王发越等重修写韵楼的情况。说升庵流放云南，依然忠君爱国，关心百姓，匡扶社稷。内容厚重，精神充盈，感情浓郁。艺术上叙事、写景、议论、抒情结合，从容挥洒，音韵谐婉，摇曳生姿，是歌行体杰作，也是林则徐的代表作之一。下面对其蕴含的几个问题进行疏释。

一是升庵“胡粉蛮花”问题。“胡粉蛮花”故事流传甚广，对此一癫狂失态行为，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升庵为了避祸而自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云：“用修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作。人谓此君故自污，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王世贞认为升庵没有什么可以忌惮的，不同意“自污”说，而认为他壮心犹在，故以游戏人生方式发泄。泸州人朱茹隆庆中为副使，作《杨升庵诗集序》云：“用修之谪戍也，世庙每询于当国者，赖以猖狂废恣对。已又询不置，将物色之，祸几及，当国者又以前语对，得以免。于是用修闻之，惕然骨慄，故自贬损，以污其迹。世乃以纵欲荡情、批风抹月用修，

亦乌知用修哉?”^①可见明世宗时刻关注升庵的行为,随时准备抓其把柄加害,升庵恐惧,“惕然骨慄”,自污之说并非无据。林文忠同意自污说,认为“锦衣竖子嫉如仇”,升庵只能“胡粉蛮花恣冶荡”,以放荡之态迷惑嘉靖及政敌。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四《〈词品〉大体可观》条说:“傅粉插花,诸伎扶觞,迹其行事,颇类风狂,然胸中实不知有几斗热血,眼中实不知有几升热泪!”

二是升庵对云南文化发展的影响。说升庵贬谪云南是天意,目的是让他增加云南人的才智。说云南地处边陲,文化落后,没有人主持诗坛。升庵到滇后,与李元阳(觉林居士)、木公(公恕)、张含(禺山)等切磋唱和、指导提携,云南诗歌得到大发展,并推动滇诗流传内地。“公恕能谐中土音”自注曰:“夷酋木君公恕,从先生学诗,先生录其诗百十四首,曰《雪山诗选》。土司之诗传于中土自此始。”苏轼流放儋耳(海南)、韩愈流放潮州,促进当地人文蔚起,升庵对云南的作用,与他们大致相同。并且力谏革除弊政。因此,滇人三百多年仰慕、追随他的美好风范,对他的祭祀(俎豆)延续亿万年。

此点世所公认。张含《读毛氏家史》(《张愈光诗文集》卷七)云:“太史逐于滇,克化滇人,向导敏学。”李元阳《送升庵先生还螳川客寓诗序》(《李中溪全集》卷五,《云南丛书》本)云:“榆之士人,无问识不识,咸载酒从先生游。先生旧尝读书点苍山中,著《转注古音》,以补字学之缺,一时问字者肩摩山麓。先生今日复至,则曩昔问字之士,皆崭然露头角,为闻人矣。识者谓:‘先生所至,人皆薰其德,文学用昌。有不及门而兴起者矣,况亲炙之者乎!’以是从之游者,日益以众也。”游居敬嘉靖三十七年(1558)任云南巡抚,与升庵有交集,升庵病重时,“数遣医诊视之”,其《翰林修撰升庵杨公墓志铭》(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四)是关于升庵生平的可靠资料,文中说:“有叩者,无贵贱,靡不应,时出绪言,以诲掖群髦。滇之东西,地以数千里计,及门而受业者恒千百人。”康熙《蒙化府志》卷五《流寓·杨慎》谓:“公怜才造士,有一善皆极为奖励,故蒙士乐从之游。”连彝族土司左正亦执弟子礼。他对云南文化的影响,确实堪比昌黎之于潮州、东坡之于儋耳,滇人宜以金身铸之。

三是表达对升庵的崇敬和慰藉。从“我亦投荒未死身”到末尾,先写自己被贬谪伊犁,遭遇和升庵相比,还更糟糕。幸好皇帝仁慈,重新起用他,持节来到云南。但自己学问无成,感到惭愧,于是借到滇西南解决变乱问题,返回时登写韵楼瞻拜遗像,焚香顶礼,向他请教。“雪鬓霜髭”两句描写升庵遗像的画面内容:升庵须发皆白,反映他长期贬谪受到的侵害;他穿着草鞋,手扶竹杖,恣情山水,寻找诗料。并说升庵形象与过去在他文集中看到的是一样的,均惟妙惟肖。最后希望升庵的灵魂归来,继续住在写韵楼,云南平安祥和,大理城镇无恙,足以让他像过去那样徜徉玉洱银苍之间。这是对升庵的期盼和告慰。而世事诡谲,林文忠离滇不久,滇乱大炽,绵延近二十年,滇西糜烂,感通寺毁于兵燹,遗像随付劫灰,令人叹惋,“悲歌问天”。

林文忠公一代伟人,他对一代才人杨文宪公的致敬,让我们加深了对升庵的理解和崇敬。

六、余论

在考论题咏写韵楼升庵事迹代表性诗人和文本基础上,尚有三事须进一步申说。

一是对升庵在大礼议中的行为之评价。题咏升庵之诗,多涉及大礼议。杨慎等在议礼中的行为,历史上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他们过于迂执、矫情、偏激,意义不大。清高宗曰:“大礼议起,诸臣不能酌理准情,以致激成过举。及嘉靖欲去本生称号,自当婉言正谏,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门恸哭,尚成何景象!虽事君父,纲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势迫安危?顾杨慎则以为仗节死义之日,王元正、张翀则以为万世瞻仰之举,俨然以疾风劲草自居,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毫无裨益。”(《御定通鉴纲目三编》之《嘉靖三年七月》条)认为杨慎等“撼门恸哭”的行为是要挟皇帝,危及君王安全,不成体统,“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毫无裨益”,几乎全盘否定。这是乾隆站在皇帝的立场说的,不乏偏见。清人沈德潜、毛奇龄、赵翼、袁枚等均持此说。^②诗中亦有此类观点,康熙著名高僧溥畹《过高峽

^① 王文才. 杨慎学谱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74.

^② 王文才. 杨慎学谱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46.

吊升庵杨太史》（《滇南诗略》卷四六）云：“只为争一字，空惹许多愁。”《明史》卷一九二杨慎等参加大礼议诸臣传的赞论说：“大礼之争，群臣至撼门恸哭，亦过激且戆矣。然再受廷杖，或死或斥，废锢终身，抑何惨也。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王思、张翀诸人，或纳谏武宗之朝，或抗论世宗初政，侃侃凿凿，死节官下，非徒意气奋发，立效一时已也。”一方面指出他们过于偏激和戆直，另一方面又肯定他们都是正直之士，为国家不顾个人生死得失，气节可嘉，激励人们“意气奋发”，产生长远的正面效果，可谓持平之论。

写韵楼咏升庵诗，均高度评价升庵在大礼议中的行为，颂扬其勇于担当和凛然气节，肯定其维护正气的意义。张裕穀《乾隆四十二年瞻升庵先生像》云：“写韵楼头意态呈，批鳞风节宛如生。一时议礼同山立，终古须眉照水清。”担当《写韵楼歌》说：“君不见撑天拄地惟气节，丈夫临难当自决。升庵太史重伦彝，触犯天威杖以百。”林诗开头就赞扬升庵“伏阙批鳞”的事迹照耀青史。其深层原因，王昶《重建永昌杨文宪公祠堂碑》说得最为透彻：

当大礼之殷也，人以一身争之，而公以两世争之；及其廷杖也，人以一次受之，而公以两次受之，茹荼街酷，千古未有。然衡以往事，定陶共王之议，争之者史丹；宋濮王之议，争之者司马光、程颢。论其世以考其人，公之谪戍，若揭日月而行，彼张璁、桂萼、方献夫者，盖冷衮、段犹之徒，何足当一映哉？世之重公者，多以博学目公，而忘其扶植纲常，激扬风义，有九死而不悔者。

把大礼议与西汉共王之议、北宋濮王之议类比，深刻阐释了升庵反对尊兴献王朱祐杬为兴献帝对于“扶植纲常，激扬风义”的意义，赞扬其光明正大，勇毅无畏。“公以两世争之”指升庵与父杨廷和均是大礼议骨干，并同遭打击。“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明史稿·文苑传·杨慎》），此恨终身未解，故父子落寞以终。而父子亦终身不悔，威武不屈，贫贱不移，浩然之气，千秋凛然。

二是升庵和云南互相成就问题。升庵入滇，领袖群伦，带动云南文化发展，泽流千载，世所公认，前文已论之。同时也要看到，云南也成就了升庵，二者实际上构成双向互动关系。“发愤著书”“诗穷后工”是我国文化创造和文学创作的规律性现象，升庵从玉堂远窜荒徼，断绝仕路，陷入逆境，终身未达，使其免除世俗纷扰，于是通过“立言”体现人生价值，集中时间心力于撰述，著书无虑百数十种，以至“明世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明史·杨慎传》）。谈迁《国榷》卷六十二曰：“慎以卓绝之才，弘博之学，谪滇南，端居深省，发愤著书，神炎理解，垂文表义。”指出其著述与贬谪之关联。尽管“晚谪永昌，无书可检，惟凭记忆，未免多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正杨录提要》）；或“窜改古人，假托往籍，英雄欺人，亦时有之”（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卷十五），为人訾议，但观其大者，炳炳烺烺，举世莫匹，究为文化奇观，洵“一代之伟人”（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七十七癸集中之下）。李贽赞其“才学卓越，人品俊伟，流光于百世”；“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宋并我朝特出”（《与方切庵》，《续焚书》卷一）。把他和李太白、苏东坡并称蜀中三仙才，而称“戍仙”者，正是基于其云南经历。

就诗文论，远至天南，滇中之壮丽景观与多样风情，拓其胸怀，广其诗料，丰富其人生体验，而以其灵心高才点化，于是诗文跳出中原窠臼，别开生面。嘉靖翰林院编修杨名《跋南中集钞》云：“升庵先生履文献之故步，发宗匠之新硎，早陟词垣，中迁瘴海，学既渊深，才复卓绝，感时触物，辄有品题，乐会悲离，实繁摘掇。”^①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说：“杨修撰之《南中稿》，穠丽婉至，远胜玉堂之作”“固一代之雄”。王文才曰：“诗歌内容，又多新境，为前人所未备，是以独树一帜，雄视一代。”^②故升庵谪滇，有不幸亦有幸，其遭遇固可同情，而其卓越成就，端赖滇南万里之行。此义担当大师“斯楼若较戍楼高，赖有轳轳成大业。大业既能垂千秋，孤忠焉敢怨迁谪”数语，已慨乎言之矣。

三是名贤遗迹对后人的感发作用问题。升庵是云南历史上声望最高的人之一，“迄今三百年，而妇人

① 转引自：王文才. 杨慎学谱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284.

② 王文才. 杨慎诗选序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4.

孺子无不知有杨状元者”(师范《明史稿·文苑传·杨慎》按语,《滇系》七之七《典故》,《云南丛书》本)。南中士人,更是津津乐道。其芳躅遍布云南,纪念设施亦为古人中最多者,林文忠诗中提及多处,有凤嬉亭、碧峤精舍、遥岑楼、仰翁楼、写韵楼。写韵楼是其中最重要者之一。写韵楼及升庵遗像,历代游历、瞻仰、题咏不绝,正是缘于对升庵的仰慕,和从他身上汲取精神力量的愿望。王兰泉《升庵雅集序》深刻阐明了这一点:“天下金石有时而泐,栋宇有时而圯隳,独文章名节之士必不得磨灭也,盖较诸名位、功业为可久。故读其文,论其事,或见其遗器,往往慷慨愤激,抚案起立,至于流涕太息而不能已,况过其生平所栖止者欤?”这就是他反复参谒升庵故居并赋诗,对升庵遗像念念不忘的深层原因。其他人亦大致如此。

华夏重贤敬贤,前贤踪迹称“芳躅”,追踪芳躅是效慕前贤的有效路径。故历代名贤所到之处,往往有纪念设施,包括名贤遗物、诗文、书画、碑刻、画像、雕像、纪念馆等。此类设施遍布国中,成为美丽、庄严的文化景观。高人雅士竞相趋谒,赋诗作文,文化积淀不断丰富,最终成为宝贵文化遗产。人们瞻仰遗迹,感受名贤氤氲的精神氛围,追思其德言功,受到精神洗礼,进而见贤思齐。名贤遗迹对人的感发、净化和升华作用,实在不可轻忽。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利用名人遗迹,十分重要。写韵楼名扬天下,但早已毁灭,大理有关方面可考虑在感通寺重修,并建成杨升庵纪念馆乃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供人瞻仰、凭吊,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这对赓续大理历史文脉、发展大理文化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大有裨益的。

The Investigation and Discussion about Poems Written to Praise Yang Shen on Xieyun Tower

CHEN Youkang

(Yunnan Chinese Culture College,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31)

Abstract: Because of Yang Shen's excellent character an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Yunnan local scholars and those from other provinces greatly admire and cherish him. They always drew personality strength and ideological wisdom from him, so that poems dedicated to him constantly appeared. Xieyun Tower of Gantong Temple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ites in Yunnan associated with Yang Shen and the poems written to praise Yang Shen reflect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nd continuous influence on Yunn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meanwhile, Yang Shen was assiduous in writing, which gains his fame. Actually, a two-wa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formed between Yang Shen and Yunnan. The poems written to praise him on Xieyun Tower show that the relics of famous sage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human sensitivities, purification and sublimation. To inherit and develop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and make good use of the historical relics to sh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Key words: Yang Shen; Xieyun Tower; Yang Shen's portrait; praise-singing poems; history of acceptance

(责任编辑:杨谨瑜)